



虞舜南巡狩与太湖东南部平原

赵东升 (南京大学历史系)

古史新证

文献典籍中有关虞舜的传说和记载,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多,结合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传说,有可能作出一些新的探索。

关于有虞氏的地望,史书大致有四种记载:

《孟子·离娄》下篇:孟子曰,“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

《史记正义》所引《孝经援神契》:“帝舜生于姚墟。”

《帝王世纪》:“瞽叟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

以上 4 种记载是文献中所见关于舜帝出生地的最早的记载,其中《孟子》、《史记》的史料价值大,所记比较可靠;《孝经援神契》是两汉之际出现的七纬之一,纬书的大部分内容荒诞不经,其中一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帝王世纪》所出虽晚,但其博采经传杂记而成书,故亦有一定的史料意义。这几种记载中提到舜帝的出生地有 3 个,即“诸冯”、“冀州”、“姚墟”。关于这 3 种说法历代有多种解说^①。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有虞氏地望问题的讨论增加了新的契机。李伯谦、田昌五、张敏等曾先后指出,分布于鲁西、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即是有虞氏文化^②。

笔者认为,鲁西、豫东说既有丰富的典籍文献之支撑,又有较多的考古发现佐证,应该符合有虞氏地望的实际情况。

关于虞舜去向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诸说,主要有几种观点: 1.陕南汉中地区; 2.湖南零陵(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 3.浙江会稽(今浙江杭嘉湖地区); 4.江淮东部地区。

“汉中说”因只见于《世本》,为孤证,故暂置不

论。

湖南零陵区至今还未发现相当于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有湘乡岱子坪遗址第二、三期文化遗存,其中部分器物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所常见,部分器物又与石峡文化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③。晚于夏时期的有零陵区菱角塘遗址,其文化遗存已与广东、广西东部和赣西南一带的几何印纹陶遗存相一致^④。类似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存,或这一类文化因素的子遗,在湘南地区根本不见,因而有虞氏部族迁徙湖南零陵之说,从考古学上无法予以证实^⑤。考虑到新石器末期的全国大势,我们并不否认虞舜部族可能也曾经迁徙到了这个地区^⑥,只是现在的考古发现并不支持我们的想法,这也是需要我们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引起注意的问题。

江淮东部说以张敏为代表,他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仅分析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虞舜迁徙的原因,虞舜迁徙的路线,甚至是具体的生活场景,而且对与当地文化交往之后形成的新的文化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为有虞氏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⑦。

邹衡、李伯谦曾经对有虞氏的去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是囿于当时考古材料的缺乏,没有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首先提出有虞氏去向问题的是李伯谦先生。在《论造律台类型》一文中,李先生指出:“比较大的可能是,造律台类型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二里头三期文化开始出现为止”^⑧。邹衡则认为,豫东的商邱地区,“未必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由于同鲁西南地区接壤,也有可能是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⑨。然而不论是二里头文化,还是岳石文化,都不是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的后继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李伯谦先生所指出的“是取代,不是继承”。

江淮东部兴化南荡和高邮周邳墩遗址的发掘以及点将台文化的提出为最终解决有虞氏的去向问题提出了新的方向。南荡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王油坊类

型晚期文化遗存基本一致,从陶器来看,有的还有继承和发展演变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有虞氏族曾经迁徙到了江淮东部地区。

近年来在太湖东南部地区发现的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因素又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它可能证明虞舜部族迁徙到了更远的太湖东南部地区。这或许证明了史籍文献和传说中的舜迁会稽地区不为虚说。

关于舜的族属,学者们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二种:一种认为舜属于黄帝族,一种认为舜属于东夷族。持黄帝族说的学者最为有力的证据是文献中记载的有虞氏的世系,认为有虞氏既然“禘黄帝而郊啻,祖颡顛而宗尧”,那么舜出身于黄帝族无可置疑,更有学者从图腾角度加以佐证,认为有虞氏以仁兽驺虞为图腾,与黄帝族以兽为图腾的特征相符。此外,持这一观点者还对东夷族说所坚持的《孟子》中记载的舜为“东夷之人”的说法予以反驳,认为“东夷”的方位在古代是相对而言的,孟子所说东夷应指山西永济。

坚持东夷族说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但对于“东夷”的确切地望却又持不同的观点,王晖认为“东夷”当指浙北上虞一带,何靖认为指今鲁西南和豫东北一带,还有学者从论证黄河以东都可称“东夷”出发,确定“东夷”应在今山西西南部一带^⑩。田昌五认为有虞氏就是居于豫东的东夷族^⑪。通过上文对虞舜的地望和去向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有虞氏属东夷族,并且是居于鲁西南和豫东北的东夷族^⑫。

二

在太湖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至今仍流传着虞舜传说,这是一种和文本传统同时存在的口头传统,造成这种口头传统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这些地方至今依旧存在着与舜相关的“纪念物”或遗迹。

说到浙江境内有关虞舜的遗迹,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东南沿海两个古老的县名—上虞、余姚。上虞与舜的关系十分密切。据郭沫若考证,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上虞”地名^⑬。《水经注》卷四十引《晋太康三年地记》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路史》称:“舜之支庶或食上虞。”《越中杂识》又说:“虞舜支庶封于余姚,又封于上虞,以虞称国,故曰上虞……而其地有历山、舜井、象田、陶灶,皆其子孙象舜所居而名之者。旧以为舜生长于是,则附会矣。”

关于余姚,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

“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又云:“舜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曰余姚。”顾颉刚先生说过:“余姚、上虞二县名及百官地名,在西汉时已成立,它们何以名姚?又何以名虞?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的原因”^⑭。关于为什么会在许多地方出现舜的传说,孔君诒曾经提出过一种观点:尧舜禹故事的原始地应该在江浙皖一带。因为舜是殷族,他的传说随着殷族的向北迁徙,所以才到了山东、山西一带^⑮。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尧舜禹的故事在此地的延续性和广泛性。

在上虞、余姚一带,除了县名之外,与虞舜相关的地名还有很多。姚江,又称舜江和舜水。宋代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所云:“水有渔浦、三抚,地有姚邱、百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灶,汲焉有井,祀焉有庙,皆其遗迹也。”据方志记载和民间传闻:握登山,是舜母的生地;虹漾村、谷林,是舜的出生地;历山,是舜耕种之地;渔浦湖(今白马湖),是舜捕鱼处;陶灶,是舜制陶处;粟里,是舜储粮处;舜井,是舜避父母迫害处;百官桥(又名舜桥)、百官里、百官镇,是舜率百官避丹朱处;指石山,是舜登山处;姚邱,是舜葬处;象田山、象田岭,是舜死后象为之耕田处;虞舜巡狩台,是舜巡狩处;舜王庙,是祭祀舜的地方;还有舜王山、舜江,也都是用来纪念虞舜的。特别要提到的是舜王庙,比起其它纪念物来,它对传说的影响就更要大得多。据乾隆《浙江通志》,虞舜庙在绍兴府境内有四座,一在余姚历山,一在上虞百官,一在上虞梁湖北,此三座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另有一处,在会稽东南百里,即今绍兴县王坛镇。历史上,以这座舜王庙为中心,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舜王诞辰”前后的几天里,绍兴南部山区和与其毗邻的上虞、嵊州、诸暨等地民众十多万人,常在此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除此之外,在嵊州市北部,距县城13公里处有舜皇山村,旧时有舜皇庙、舜井。后因建造龙皇水库,庙、井均已为水淹没。在萧山的南部桃源乡有舜湖,所在地的村落称为“舜湖村”。在永康县南部,有一处釜历山,山颠有舜田、舜井、舜潭。正是以上这样一大批与舜相关的纪念物(遗迹)的长期存在,为太湖东南部地区虞舜传说圈的形成及其绵延不绝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我们研究虞舜文化的一个需要考虑的地区^⑯。

三

太湖东南部除了虞舜的传说之外,还有关于防风氏的传说。防风氏神话传说处在华夏集团大举南侵,武力征服与文化融和百越民族这一历史时刻^⑰。

有关防风氏的记载古籍中并不多,散见于《国

语》、《史记》、《越绝书》、《述异记》等,其中以《国语·鲁语下》交待得较详细。

《国语·鲁语下第五》云:“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仲尼曰:“(防风氏),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韦昭注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故谓之神也。”

《史记·孔子世家》: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集解》韦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吴郡永安县。’駮案:晋太康元年改永安为武康县,今属吴兴郡。为釐姓。(《索隐》釐音僖)。《家语》云姓漆,盖误。《系本》无漆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集解》王肃曰:“周之初及当孔子之时,其名异也。”

《后汉书·张衡列传》: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于稽山。汤谷,日所出也。孔安国注《尚书》:“禹代鯀为崇伯,故称伯。”《吴越春秋》:“禹登茅山,大会计理国之道,故更名其山曰会稽”也。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左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国语》仲尼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客曰:“敢问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食言谓后至也。”

《晋书》卷十五 志第五:乌程 临安 余杭 武康故防风氏国。

《通典》:“湖州,春秋时属吴,吴灭属越,越灭属楚,古之防国焉。”《太平寰宇记》:“湖州武康县,古防风氏之国,防风氏在县东一十八里,先名封山,唐天宝六年敕改焉。”《路史·国名纪乙》载:“防风,厘姓,守封、禺之间,二山在今湖州之武康。”罗苹注:“《吴兴记》云:吴兴西有风渚山,一曰风山,有风公庙,古防风国也。下有风渚,在今武康东十八里,天宝改曰防风山。禺山在其东二百步,《说文》作禺山,禹十二代孙帝禹所居,皆妄。今钱塘之金鹅山,《郡国志》云:防风氏封此,山下有风渚。然谓古即瞞国者,又缪。”《国名纪乙》并列有汪芒,“即汪罔,《说苑》云:汪芒,厘姓。《说文》云:封山在吴楚间,汪芒之国,历代故以为防风也。”

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各地已经采录的防风氏口承资料有21则,防风祠遗迹5处,基本都分布在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范围内。其中以德清县封山南麓的防风祠最著名,它始建于西晋元康初年,距今1700多年,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鏐加以扩建,今已废圮,仅存殿基,可看出规模极大。湖州市三合乡还有

与防风有关的封山、禺山、风渚湖(又称下渚湖)、防风洞、防风井等遗迹^⑧。

通过以上文献和口承资料,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防风氏分布的中心地在浙江省湖州市,而其活动地域涉及宁绍平原、上海和苏南等太湖东南部广大地区^⑨。

关于防风氏的族属问题,学者多有论述。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董楚平的东夷说^⑩,方酉生的古越先祖说^⑪和何光岳的先黄帝后东夷说^⑫。根据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我们倾向于其为古越固有支系的意见^⑬。

研究防风氏的学者基本都认为防风氏部族在夏代以前已经形成。但是在防风氏与具体考古学文化的指认上却仁智互见,有的认为防风氏就是良渚文化的主体^⑭;有的认为其产生于良渚文化鼎盛时期(或晚期),是良渚先民中一个大部族的首领^⑮;有的认为防风氏自河姆渡文化始就已在太湖东南部繁衍生息,直到良渚文化末期被华夏族所灭^⑯;还有的学者论证防风氏本居山东,商周时才迁居到吴越地^⑰。我们认为防风氏应该是在良渚文化末期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活跃的力量^⑱。

太湖东南部还有夏禹的传说。《越绝书》卷八:“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史记·夏本记》:“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墨子·节葬下》:“葬于会稽之山。”

以上的传说都涉及到一个地名会稽。以往研究的会稽地望涉及到浙江杭嘉湖平原、安徽涂山、山东、辽西、河南、河北等地。在对诸家观点——辨析以后,我们发现,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绝大部分明确认定禹巡狩和归葬的会稽位于江南。到了秦代,秦始皇“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到了西汉,司马迁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直到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汜论训》才提出会稽在他的家乡辽西的观点,同时又并提“一说会稽山在太山下”的观点。20世纪初杨向奎先生提出会稽本在山东的观点后^⑲,才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赞同者。

关于大禹和越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越为禹后,夏族是在夏末商初随着夏朝的败亡而开始迁徙此地的。只是禹在此治水和归葬此地的传说不符合实际^⑳。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反对越为禹后说^㉑。笔者认为,华夏族和越族本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部族为了彻底消灭各地的抵抗力量才来到了越地,也就把中原的文化因素带到了越地,或许还开始统治了古越地,这从稍后的马桥文化中含有

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就可以看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各传说与实际地望的耦合上可能有所偏差，我们只能指定一个大致的位置。因为古代部族的生活区域经常变动。尤其是在社会大重组的原始社会末期，再加上不同地域的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有所不同，也会成为传说丰富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实际生活区域当不会超过这一大致位置。

四

在太湖东南部平原上存在的最大的三个传说是关于有虞氏、防风氏和夏禹氏的。那么为什么不同族属的三个部族会同时出现于这个地区呢？我们认为：华夏族侵占了有虞氏在豫东南的居地后迫使有虞氏南迁，有虞氏先后到达了江淮平原东部和太湖东南部。在太湖东南部与本地固有的防风氏集团联合形成了一股反抗夏族的强大力量，从而招致了夏族统治者的诛杀。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1. 良渚文化的灭亡与防风氏的关系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古文化之一。然而，就其年代下限和消亡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最近在湖州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表明，良渚文化晚期之后，大致距今4300~4000年前后^②，分布在太湖地区的是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它上承良渚文化晚期，是良渚文化的延续或后续。这样，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就可以分为良渚文化晚期、以鱼鳍足鼎及细颈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即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和广富林文化三种时代先后的文化遗存^③。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以前学术界先后出现了海侵说、特大洪水灾害说、对外战争说和统治集团内讧说等多种观点。目前，学者多认为良渚文化末期的洪水事件更有可能是良渚文化衰亡的导火索。在良渚社会鼎盛期之后，面对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只要一点燃这根导火索，这个社会就会一泻千里，无法挽回^④。考虑到防风氏治理洪水的神话传说，笔者认为，点燃这根导火索的正是防风氏。而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可能正是防风氏所创立的文化。

2. 有虞氏与防风氏的关系

上文已经提到，有虞氏文化在太湖地区表现为广富林文化，那么广富林文化和与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防风氏文化的关系如何呢？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被分为两期，第一期早于广富林文化，而第二期大致与广富林文化同时^⑤。依据出土的材料，

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两期之间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在第二期时不光继承了第一期的文化内涵，同时渗入的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的因素更多，在本地也就是广富林文化的因素。而广富林遗址中第一段大致与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第一期时代相当，当归为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而第二段则被认为与第一段无源流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类遗存^⑥。第二段应该就是有虞氏的文化遗存。笔者认为：防风氏部族创造的文化大约在4300年左右取代了良渚文化，而表现为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分布范围遍及苏南、上海和宁绍平原，而中心应在杭嘉湖平原地区^⑦。4200年左右有虞氏部族的到来打破了这样的格局，取代了防风氏在上海地区的统治区域，在广富林遗址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不同文化相互取代的情况^⑧。这样在太湖东南部地区就形成了两种文化交流联合的态势。它们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共同分布于太湖东南部地区。

3. 夏族与防风氏的关系

龙山文化中晚期，整个社会正处于大迁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战争契机、治水契机、海侵契机和以中为尊契机的影响下^⑨，华夏族势力向外扩张，并且参与到边远地区文化的重建当中。太湖东南部地区也不例外。从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征来看，无论是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还是广富林文化遗存都远没有二里头文化发达，如果单是势单力薄的防风氏，断不为夏所惧的，但是被华夏族逼迫南迁的有虞氏部族的介入，无疑将会成为夏族的心头大患。防风氏与有虞氏的联合无疑会成为华夏族扩张的障碍。大禹诛防风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而在这一过程中，有虞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者^⑩。大禹诛防风，是夏族与有虞氏和防风氏矛盾尖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4. 有虞氏在江淮地区东部和太湖东南部特点的对比

相对于在江淮东部地区的存在时间来说，太湖东南部的虞舜文化生存的时间非常短，并没有像在江淮东部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点将台文化那样发展，此地后来兴起的马桥文化中主要包含的是当地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因素^⑪。江淮东部地区地势低洼，生存比较艰难，发展的空间很小，并没有引起夏族的注意。而太湖东南部古文化发展基础好，发展势头猛，所以有虞氏在此地的生存就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夏族注意而导致毁灭为结局。

五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龙山时代到夏代初年,太湖东南部地区先后分布着防风氏、有虞氏和夏禹氏部族的文化。防风氏是适应良渚文化末期治水的形势而兴起的一支新兴力量,它最终取代了良渚文化。有虞氏是在华夏部族的逼迫之下由中原经由江淮平原东部而最终迁居此地的,在此地与防风氏联合的基础上创造了广富林文化遗存。有虞氏与防风氏的结合导致了夏族对此地的军事行动。此后夏族对此地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中原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之间也就开始了广泛的交流。

2. 龙山时代中晚期是个大动荡的时期。太湖东南部地区由于某种尚无法确定的原因,经历了发展史上少有的低潮期。该地区古文化发展中原来相对单一的清晰稳定的继承模式被颠覆,古文化发展轨迹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外来文化参与了古文化的重建。从南荡、广富林、钱山漾,再到点将台、马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北方龙山文化因素和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南渐甚至是部族南迁的进程。

以上这些就是虞舜南巡狩的实质,以及广泛流传于此地的防风氏、有虞氏和夏禹氏的神话传说的本源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考古材料不甚系统,历史文献相对缺乏的条件下而形成的认识,尤其是其中关于防风氏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传说,难以考实。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注释:

① a.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于《五帝本纪》“冀州之人也”句下注云:“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 b.《史记正义》又于“舜耕历山”句下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濮州雷泽县,“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 c.宋代孙奭《孟子疏》认为《孟子》与《史记》的记载一致,故谓“今云舜生于诸冯,则诸冯在冀州之分。”即认为举方域是为冀州,论具体地名则为诸冯。 d.宋代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谓“诸冯,在河中府河东县,其地有姚墟。” e.清代焦循《孟子正义》谓:“青州府有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说者以为即《春秋》书城诸者,其地有所谓冯山、冯村,盖相传自古,就疑近是。”乃谓诸冯在山东之诸城县。 f.杨伯峻《孟子译注卷八·离娄章句下》谓“诸冯,传说在今山东菏泽县南五十里。” g.徐旭生明确指出:“今河南极东与山东交界处有虞城县,秦与两汉时全叫作虞县,自来也认为是虞国旧地,这与《孟子》所说相合……虞城为有虞氏的旧地”。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脚注。 h.郭沫若认

为有虞氏的活动中心在豫东的夏邑。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6页。

② a.李伯谦依《左传》哀公元年少康“逃奔有虞”及社注:“有虞,梁国虞县”之史料,指出“有虞即秦汉时的虞县”。从(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笔者注)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分析,造律台类型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 b.田昌五认为:“帝舜有虞氏姓氏,在今天豫东地区。古代在今晋南地区确实有一个有虞氏,只不过是姬姓有虞氏,可能就是后来被晋国灭掉的虞国之先”,“把姚姓有虞氏如实地恢复起来,它只活动于今豫东地区”,“帝舜部的文化即王油坊类型的中原龙山文化”,“舜在夏代之前,这和王油坊类型的年代是相当的”,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反映了这种类型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田昌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23-146页。 c.张敏在归纳诸说的基础上认为:“分布于豫东皖西北的颍水、涡水、西淝水、浍水流域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即有虞氏部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一地区亦即有虞氏的地望。”见张敏、韩明芳:《虞舜南巡狩与勾吴的发端》,《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③ a.湖南省博物馆:《翻乡岱子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 b.何介钧:《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湖南省文物局:《1979年以来湖南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张敏、韩明芳:《虞舜南巡狩与勾吴的发端》,《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⑥、⑩ 从中国其他有虞舜传说的地区来看,都伴随着“禹征”的传说,比如湖南永州的虞舜传说,就伴随着禹征三苗的传说。似乎可以说明,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族和东夷族的冲突是非常剧烈的,华夏族要想取得统治地位,必须先要彻底排除东夷族的势力。此时,东夷族的迁居和在当地文化的融合体中,应该是占有领导地位的。

⑦ a.张敏:《华夏文明起源的假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b.张敏、韩明芳:《江淮东部地区原始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c.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d.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谱系与族属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 e.张敏:《南荡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⑧ 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⑨ 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⑩ 周惊涛:《全国虞舜文化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

⑪ “平粮台一期为大汶口文化,更能证明虞舜为东夷之人”,“众所周知,大汶口文化为古夷人的文化,这和孟子所说的‘东夷之人也’不期而合”。田昌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

⑫ 吴国武:《舜舜姓氏考辨-兼谈先秦姓氏礼俗的几个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⑬ 郭沫若:《卜辞通纂》475-480页,第595-602片甲骨,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⑭ 顾颉刚:《夙初小说回目考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

⑮ 孔君诒:《虞舜耕地葬地的探讨》,《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⑯ 顾希佳:《虞舜传说与吴越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⑰ 钟伟今 钟铭《防风故土》考察报告》,《湖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⑱、⑳ 董楚平:《防风氏神话的新发现》,《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㉑ 钟伟今:《防风神话研究现状概述》,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3集,总第十五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㉒ 董楚平:《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

㉓ 方酉生:《从良渚文化的衰落说到防风国及于夏王朝的关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㉔ 刘城淮:《防风与夏禹》,《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12卷第6期。

㉕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从众多的考古学遗存中分辨出华夏、东夷和苗蛮的因素。目前在太湖东南部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除了广富林确定为虞舜部族的以外,其他均是混合文化,并没有再发现独立于当地土著文化的华夏、东夷或者苗蛮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偏向于防风氏是来源于本地传统的一支古越部族。

㉖ 方酉生:《试论良渚文化与防风国》,见蒋炳钊主编:《百越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㉗ 张长工:《从良渚文化的断代释神话“大禹杀防风”》,转引自: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3集,总第十五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㉘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三章第一节《越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㉙ 良渚文化因洪水或海侵而消亡已经有不少学者论证过,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马桥文化时期遗址数量的大量减少和文化层之间的广泛分布的淤泥层可以表明或许当时确实发生了大洪水。可以参见:王海明:《浙江史前考古学文化之环境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本书的其

它相关文章。兹不赘述。重要的是谁来治水,而最终良渚文化又被谁所取代。结合最近钱山漾遗存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发现和传说中关于防风氏为治水之神的记载,我们认为,防风氏即是应治水的需要而壮大的一支部族,并最终取代了良渚文化。其创造的文化即是钱山漾一、二段的遗存。参见丁品:《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5日一版;《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㉚ 杨向奎:《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禹贡》,1994年第3期;另见:《夏代地理小记》,《禹贡》1994年第3期。

㉛ a. 林华东:《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于越源流》,《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 b. 林华东、何春慰:《再论绍兴会稽与大禹》,《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林文中所提的夏末商初夏族开始南迁吴越地的观点有出入,因为马桥文化的年代已经提前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它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自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有关马桥文化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㉜ 蒋炳钊:《“越为禹后说”质疑》,《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

㉝ 关于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可以参见蒋卫东:《良渚文化下限年代的探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人民出版社,2006年。

㉞ 宋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㉟ 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㊱ 丁品:《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㊲ 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年4期。

㊳ 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的地点主要有:吴江龙南、上海广富林、湖州钱山漾、绍兴仙人山等。

㊴ 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地点主要有:江阴花山、昆山绰墩、上海广富林、湖州钱山漾、宁波慈城小东门、绍兴马鞍、绍兴仙人山等。关于广富林遗存的年代可以参见:翟杨:《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㊵ 张敏:《华夏文明起源的假说》,《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㊶ 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特约责编:徐义华)